

新旗

第八期

半月刊 實售國幣三百元

政府問題應如何解決？

三男

「壞政府」不能再存在下去。事實擺着，便是執政者自己也知道得清清楚楚。如此這般的政府，不但在野的黨派反對牠，老百姓怨恨牠，就是做牠靠山的美國，對牠也頗不滿意。反動的執政派即使不怕在野黨派的反對，不管老百姓的怨恨，可是爲了敷衍美國，也不得不表示政府現狀的必須改變。

如何改變這「壞政府」呢？現在有三種意見：一、擴大現政府；二、組織聯合政府；三、召集全權普選的國民大會。第一種意見是國民黨主張的；第二種屬於共產黨及民主同盟；第三種是少數徹底的民主主義者（即革命的社會主義者）所主張，我們從來也抱着這個見解。

「請客式的」擴大政府，就是說，「壞政府」原封不動，但請在野黨的幾位領袖加入進去，担在幾個不重要的部長。這辦法之無關於民主，無補於國事之解決，那是太清楚了，中共與民主同盟的刊物上已經批評得十分痛快，十分足夠，毋需我們再說；總之，這是一種虛假的掩飾，反動的偽裝，其作用僅能替「壞政府」遮醜，叫不滿的大衆受騙，結果是於民主絲毫無益，於革命大大地有害。

現在一般進步人士都寄託全部希望於聯合政府。具體說，都贊成根據政協決議，把目前的政府改組。究竟如此改組出來的政府能有多大力量，我們祇叫看政協對此問題如何規定好了。政協的決議主要有如下四點：第一、承認「以現政府爲基礎」；第二、「國民黨人占國府委員名額之半」；第三、國府主席只叫有五分之二府委的支持，便可推翻國府委員會的決議；第四、行政院政務委員會中不足

三分之一的席次由國民黨以外人士担任。這四點已很清楚地說明了人們所熱望的那個聯合政府的真相：「壞政府」基礎不變，議政機關由「壞政府黨」占二分之一，行政機關由「壞政府黨」占三分之二以上，同時國府主席仍保有獨裁權力。此外，還有一層必須明白：在那半數與三分之一的加入政府的非國民黨人中，包括那個業已被「壞政府」收買的青年黨，上層某些份子已在動搖的民主同盟，還有王雲五式的「社會賢達」。如此說來，表面上是「二分之一」與「三分之二」，實際上還要得多。我們能希望這樣的聯合政府做出奇蹟來嗎？我們能說牠比「請客式的」改組政府好些，甚至比目前的「壞政府」好些嗎？

如果這樣的聯合政府成功，事情不但不會比現在好些，甚至還會壞些，因爲：本質上仍舊照樣地壞，而表面上却「民主」起來了。一塊爛臭肉，加上些鮮豔的偽色，那是大大地害人的。

第八期目錄

政府問題應如何解決？	三男
關於勞協事件	振聲
十月革命道路	鳳崗
論「中間派」(下)	蘭因
從田賦說到土地革命(讀者論壇)	大化
保甲制度壓榨下的農民(慈裕通信)	益輝
人生觀與社會主義(讀者通信一)	言保珍
中立與是非(讀者通信二)	管佩秋
中國革命悲劇(續)	Harold R. Isaacs

發行者 新旗社
 通訊處 香港西灣河太古船塢李振聲

不過有人說：這樣的聯合政府果然不好，但由此阻止了內戰，不是值得的嗎？其實這樣的聯合政府還是阻止不了內戰的，充其量，不過是換一種方式的拖而已了。要想以這樣的聯合政府來阻止內戰，祇有在一個情形中可以實現，那就是共產黨願以少數黨員加入政府的代價，片面地解除了自己的武裝。共產黨是否會如此做呢？多半不會的。不過即使這樣做了，那末唯一結果，將是中國之更加遠離民主，將是『聯合政府』之較目前的『壞政府』更壞。因為，不管我們對內戰以及由黨派控制軍隊二事採取何種態度，可是在目前情形中，共產黨武力對於國民黨政府多少起着解毒劑與防腐劑的作用，却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

所以像政協會所決定的聯合政府，如果真的實現了的話，實在是一無好處的，轉唯一的作用，只是替『壞政府』做一番粉飾工作，癱瘓民眾真正為民主與革命的鬥爭吧了。

——那末較好的聯合政府何如？如果聯合政府不以國民黨政府為基礎，如果國府委員會員額的分配於中共及民盟有利，豈不好嗎？至少，不比目前的『壞政府』好嗎？——我們聽到了有人提出這個疑問。

要解答這個疑問，我們祇叫指出一點好了：不到最後關頭，統治黨祇肯給『請客式』的聯合政府；一到最後關頭，革命黨便不應該接受任何方式的聯合政府。如果接受『請客式』的聯合政府是幫助統治黨的忙；那末當危急時候，統治階級為了自己的存在而願意讓出大部分官職的時候，在野黨若接受了這樣的聯合政府，則幫了政府黨以更大的忙。所以革命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遺教之一，便是在任何條件中，都不要參加統治階級的政府。第二國際的墮落一部分由於拋棄了這個教訓，第三國際的破

產則以其聯合政府策略而得到了最後完成。

最近世界各國的歷史上充滿着此種聯合政府的悲痛例子，也充滿着此種政府的教訓：在第一次大戰後的德國，在一九三六年前後的法西兩國，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者參加了資產階級的政府，結果都幫助了統治階級渡過難關，以便事後讓資產階級建立獨裁；目前的法國，意大利以及最大多數的歐洲國家，也都成立着聯合政府；可是事實證明，都已在相當程度內，幫忙穩定了資產階級的統治。如果這局面繼續下去，中間沒有一個真正革命工人政黨起來奪取全部政權，建立工農政府，則此種國家的聯合政府，遲早都要讓位於資產階級的獨裁，甚至法西斯式的獨裁的。

英國的現政府表面上完全屬於工黨，但事實上却也是一個聯合政府；工人政黨占據着政權的表面，資產階級則握住政府的實權。阿特里政府和過去兩次的麥唐納政府一樣，其作用不過等工人羣衆較為平靜的時候，把政權交還給保守黨吧了。

如此說來，聯合政府不過是統治階級及其黨派在危機時候的一個應急武器，還不清楚明白嗎？這樣的武器於統治黨有起死回生之效，但於要求徹底改革的在野黨及其所代表的民眾，却是有害而無一利的。中國共產黨如果真的為了中國最大多數民眾的利益，真的為了中國革命任務的解決，不是為了少數幾個領袖的出處，就必須拋去聯合政府的口號。

以上所說，乃是就革命利益而言的；假使以為革命的名義不『正大』，那末我們還可以從『法律與人民』的立場來討論這個問題。共產黨，或者民主同盟，不管牠的主張與政綱如何與人民的利益相符，但總只佔人民中的一小部分。國民黨的政府是壞的，因為牠違反了人民的意志與利益，所以須得

代替，但用什麼方法來代替呢？唯一的辦法，就得徵詢一下全體人民的意見，這才合乎人民的利益，這才合乎民主的法律。如果照政協的辦法，或照更好的辦法，由幾個政黨的領袖協商結果，安排好一個新的政府，那不過是黨派政府，說得壞些，是『分贓政府』，決不是全體人民的政府。這樣的政府在人民眼中也不會是好的。

因此，無論從真實的革命利益說，或從形式的民主立場說，聯合政府都是要不得的，與國民黨擬行的所謂『擴大政府』沒有什麼實質上的不同。所以要解決政府問題，我們認為：必須由平等直接記名的普選方法產生全權的國民大會，由牠來解決一切問題，包括政權問題在內。祇有這樣，我們認為，才可以新起爐灶，根本與壞政府絕緣，依據全體人民的意志建立起一個好政府來。

不過說到這裏，我們又聽見了兩個反對意見：一、在一切權力都握在壞政府手裏的時候，如何能依最民主的方法產生出真能代表民意的政府？二、在現政府之下普選全權的國民大會，即令選出了這樣理想的會議，不暫時延長了壞政府的生命嗎？為什麼不可以先改組了壞政府，然後再進行普選呢？

在回答這兩個疑問之前，我們先得做如下聲明：我們毫不懷疑現政府將盡其一切可能來阻礙這種國民大會的選舉。同時，退一步說，即使這樣理想的國民大會實現出來了，如果國內各階級力量的真實對比沒有變更，牠也只能做壞政府的裝飾品的。那末我們為什麼不贊成易見成效的改組政府或聯合政府，而如此堅決地主張國民大會呢？最簡單的回答，就是：為了革命的利益，但是為什麼聯合政府違反革命利益而國民大會符合這個利益呢？一句話：前者是既成政黨上層份子的拉攏，是妥協的辦法；而後者則是喚起全體民眾，起來解決自身問題，

是革故鼎新的道路。不管這道路上存在着多麼大的障礙，但其基本的精神與方向，却總是革命的，徹底的，是自下而上的。但是爲什麼非自下而上不可呢？又是一句話：如果不讓龐大的人民大眾直接起來參加政治，中國的僵局是決計不能打開的。中國目前一切問題中的問題，可以歸結到如何讓最廣大的人民起來，而人民參加政治的現成公式，就是全權普選的國民大會。因此我們主張這個國民大會。

然後我們可以解答那兩個反對意見了：第一，讓政府大權在握，自然有力量不讓老百姓根據自己的意志投票；但只叫是平等直接無記名的普選，只叫人們享了法定的選舉權，只叫他們被喚起了對政治的關心，那末政府的任何干涉，都將是給民衆一次政治教育，一次革命訓練，其效力，其遠果，要大大地超過什麼聯合政府的。如果強姦民意，包辦壟斷地選出了一個國民大會，這自然無補於國事的解決，但在這一虛偽選舉的整個過程中，被強姦的民衆對政府的認識却更加清楚了，幻想也就更少了。第二，先改組了政府，或先組織了聯合政府之後再進行國民大會的選舉。這對於選舉的進行上是否能有多民主，是一個大疑問。（多半是不會的，因爲上面說過，這樣政府的實權仍舊操在執政黨的手裏。）可是這樣一來，却有一個大毛病，便是：在野黨分担了壞政府的責任，以致在爲國民大會的產生而作的鬥爭中，緩和了人民大眾對執政黨的仇恨。這不是『暫時』延長，倒是長久延長了壞政府的生命了。

我們自然不能對一切現實問題閉起眼睛。爲使最民主的普選全權的國民大會得以產生，爲使產生前減少國家人民的損失，又爲使產生後能真有權力解決問題，我們必須號召全體民衆立即起來，依生產的地位，組織在各個民衆團體裏，爲下列的先決條件的實現而鬥爭：一、立即無條件停止內戰；二、各黨派合法存在；三、立即實現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的完全自由；四、立即取消特務制度，保障人身安全；五、立即撤退美國在華的駐軍；六、立即取消保甲制與警管制；七、立即組織兵士委員會，予現役兵士以投票權；八、立即實現八小時工作制使工人有時間與精力參加政治；九、立即沒收土地歸貧農，使最大多數的農民能吃饱肚皮來過問政治……

此外，我們還主張由各個民衆的團體，如工會農會及兵士委員會等，選派代表，組織選舉監視團，監視各個地方（不分國民黨區或共產黨區）的民主選舉。

祇有靠有組織的人民力量，才能實現這些先決條件；祇有實現了這些條件，才能產生真正普選的國民大會；也祇有實現了這些條件，才能使普選出來的國民大會賦有全權，藉以解決一切問題。

關於勞協事件

振聲

中國勞動協會重慶分會，於一月前被國民黨特務組成的所謂『市總工會』會同警察『接收』了。此事發生，引起了中國一切進步分子與各工會的抗議，而且也引起了國際工人組織的抗議。

我們也願意在這些抗議書上簽下自己的名。因爲這是執政黨反動派反對一個工人組織的暴行，我們在任何鬥爭與任何情形中都要站在工人一邊的。

不過我們參加這個抗議，並不表示在政見上與中國勞動協會一致。站在工人階級鬥爭的利益上，我們必須公開地說明這一點。

勞協是一個較近的組織，但它的負責人宋學範等等，本是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國民黨的官工，起着國民黨在工人階級中的代理人作用。在反革命加深的幾年中，他們一直是黃色工會的領袖，屢次被政府派作『工人代表』，出國去參加一些國際的勞工會議。在鬥爭中，他們總是表面上站在工人方面，而實際上站在資本家方面，解決一些勞資糾紛。因此，十幾年來國民黨所從事由宋學範等在執行的『工人運動』，非但得不到工人的擁護，而且獲得了他們的消極的仇視。

這是事實。這事實不但說明了宋學範等個人的經歷，而且也說明了整個中國改良主義工人運動的命運。半殖民地中國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的直接壓迫之下，祇能以最慘酷的手段來榨取工人階級；否則，他便無法存在了。因此，中國改良主義的運動從來不能發展，也因此，國民黨的工人運動從來祇能是特務與流氓控制的別名。

但中國勞動協會却是一個特殊現象。牠雖然仍在宋學範以及國民黨某系黨人的控制之下，但作風是不同的。牠確實替工人做些事，給工人辦些福利事業，領導一些工人的鬥爭，並且創立許多工人的組織，因之，牠也確實獲得不少工人的擁護。中國勞動協會在中國工人運動的歷史上，第一次造成了一個相當有力的改良主義運動。

這應該如何解釋呢？

第一，我們知道，勞動協會是美國的二次改良主義工會——美國勞動聯合會與產業組織大會——捐款創辦的。牠的一切經費，一切事業，都靠着這筆巨額美金的捐款，這就是說，都靠着美國改良主

義工會的幫助，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目前這點改良主義運動，乃是美國的改良主義的分支，是她在中國的代理人。不錯，這筆捐款全都是美國工人弟兄們的血汗錢，他們的捐助自然完全由於無產階級超出國家的階級愛，我們工人應該十分感謝的。不過這就是直接捐款的工人說的；倘該美國工會的高級領袖說，就執行華爾街政策的國務院說，這筆對華捐款，多半是用心良深的，他們希望在中國造成一個强有力的改良主義勢力，以便和中國共產主義的工人運動對抗。美國這些工運專家與目光遠大的外交家是知道的：要使中國不赤，最重要的一個條件就是要在中國工人階級中造成一個強大的改良派。國民黨無此力量，也無此見識，中國一般的資產階級自然更談不上，於是美國直接來投資了。

第二、國民黨中某幾個專門負責『工人運動』的中統系的官僚，預見到戰後工人運動的興起，中共勢力之膨脹，於是決心利用美國的幫助，扶植一個改良主義運動，以便控制整個工人階級。

第三、中共由於其階級合作的政策，及其聯絡民族資產階級的企圖，再加上牠多年來的脫離城市，在工人階級中沒有力量，所以也就擁護着勞協，與朱學範合作。

這三種情形造成了今日中國勞動協會的聲勢。勞動協會的積極活動開始於抗戰首都的重慶，但長成於工人階級壘壘的上海。一年來，上海的工人鬥爭，造成了勞協的羣衆基礎。在這些鬥爭中，勞協，雖然本着牠一貫的妥協態度，本質上總站在資本家方面，但牠爲了在羣衆中獲取初步信仰，總算領導了好些鬥爭，並且組織了許多工會。結果，朱學範及其勞動協會，確實在上海工人的心目中有了地位了。

但即使是在美國工會，國民黨一部分官僚以及中

共的聯合支持之下，勞動協會所代表的改良運動還是很快達到了極限；中國的資本主義太貧弱了，牠担不起這個改良的重担，資產階級憤怒了，大叫『中國工人的工資高過了美國工人的』，聲音『六個月以內就要同歸於盡』，人們紛紛以關廠歇業等等來要挾了。於是勞協的主人——朱學範，立刻露出了他本來的面目，高呼止步，力言勞資合作的重要，他又故調重彈，到處去鎮撫工人的罷工。自從本年七月以來，勞協對工人的鬥爭即使不出於直接干涉，也總是消極旁觀的。

可是資產階級及其國民黨却連這樣的勞協也不願牠繼續存在，配合着全面內戰，趁着整個的反民主高潮，他們在勞協的初期活動地向這個改良主義的組織進攻了。這就發生了前月間重慶勞協事件。

對於這件國民黨的暴行，我們說過，我們自然堅決反對。

不過趁着這個事件，我們要再一次地提醒友人們：中國改良主義的工人運動是無法存在與發展的。勞協證明得清清楚楚，即使有美國的幫助，即使在國民黨官吏的直接控制之下，資產階級與國民黨政府還是不能讓牠存在。中國工人階級爲想得解放，甚至祇爲了生活改善，都必須經由不妥協的階級鬥爭。朱學範及其勞協的道路走不通，中國共產黨的合作道路也是走不通。

十月革命道路

蘭 因

最近，大公報總主筆王芸生先生，在新創刊的『觀察』雜誌上發表『中國時局前途的三個去向』文章。據他們的判斷，中國時局有下面三個前途：

(一)南北朝，——即以江淮爲界劃分中國爲南北兩朝，南朝歸國民黨統治，北朝歸共產黨統治。

。王先生說這是中共要走的道路。

(二)十月革命，——即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王先生說共產黨不要走這條路，不過中國『客觀的條件卻在發展進展着』。王先生從政治經濟軍事三方面說明中國有走上這個前途之可能。尤其在軍事方面，他說：『士兵一聲響槍，中國的十月革命馬上出現。』

(三)政治協商道路。——即各黨派和平合作建設新中國。王先生說，這是當前中國極理想而又極藝術的前進之路。他毫不躊躇地希望中國不要走前面兩條道路，祇要走第三條道路。

好多年以來第一次，我們在公開的論壇上聽說了：中國能走十月革命道路。更奇怪的，是說這話的人不是中共黨員，也不是同情的人。而是有名的半政府報總主筆。中共及其同情者則是堅決否認能走這條道路的。全部的『新民主主義論』證明甚麼呢，倘若不是證明中國不能走十月革命道路？

但是王先生認爲中共祇要走南北朝道路，而不要走政治協商道路，——那是冤枉了中共的。中共把武裝隊伍撤退到江淮以北去，乃是不得已的辦法，牠原是要經過政治協商道路，與國民黨聯合執政來建設新中國的。

從毛澤東到重慶起至今一年了，這一年政治協商得到了甚麼結果呢？甚麼都沒有結果，除了證明這條道路走不通。所以國民黨當權者一天比一天更加堅持他們的一黨專政道路，國內戰爭不可避免，南北朝局勢也不能長保了。共產黨應當毅然決然走上十月革命道路，應當拋棄政治協商能解決問題的幻想。可是牠至今還沒有這個決心。

連王芸生都說中國客觀條件已在發展着十月革命道路了。現在祇缺少一個羣衆的革命黨，能在主觀上堅決走上十月革命道路。

保甲制度壓榨農民的

(試通緒慈)

浙江慈谿縣東鄉，洪塘鎮，莊橋鎮，駱駝鎮，洋墅鎮等地方，四面是被四明山圍繞着，風景優美，像是一個桃花源，別有天地。一般人民大都是務農為業，從前稱為富饒之區，人民的生活可能過得下去。

自從日本帝國主義侵華以來，這個四明山下的桃花源，變成炮火瀾漫的游擊區，今天和平軍打來，明天共產黨三五縱隊打去，後天又是國民黨的宋部隊與共產黨三五縱隊火併，輾轉擾亂，勒索搜刮，弄得一般農民難過日腳。

這裏的農民對抗戰是冷淡的，對軍隊是惡感的，不僅對漢奸和平軍是恨入骨髓，就是對國民黨的宋部隊亦是怨恨至極。比較有好感的要算共產黨的三五縱隊，後來三五縱隊濫發抗幣，刮削過甚，農民對他的好感亦漸漸變為惡感了。

和平以後，農民們希望着能過戰前一樣的生活，能透透連年戰爭所受痛苦的氣，可是農民生活沒有得到一點子改善，反而變本加厲的受到壓迫，日日呻吟在苛捐雜稅田租高利貸及保甲制度的壓榨之下。

『抗戰勝利』了，政府大發慈悲，頒佈三十四年度免徵田賦一年，但是追加補收三十二年和三十三年的田賦，每畝徵收穀二十八斤，而且縣政府和鎮公所還徵收公糧穀（俗稱積穀），其數量每畝竟達一百十斤左右；再加上業主的租數每畝要收一百餘斤；於是三十四年度農民收穫的穀，都被政府和保甲鎮公所以及地主們所吞刮盡了。

三十五年度實行『二五減租』和『停徵積穀』，這是勝利後政府支付給農民的一張支票，歷年來

論『中間派』(下)

鳳岡

政策與前途

那末怎樣產生出目前聲勢相當浩大的中間派的政治運動來呢？難道沒有社會基礎嗎？不，牠是有社會基礎的。我們說牠『終於會懸掛在半空中』者，祇因這個社會基礎雖能造成一個廣泛的政治運動，却不能變成一個強盛的政治力量之故。目前中間派這個相當大規模的政治運動，祇因為下面這三個暫時湊成的條件：一、廣大的城市小資產階級羣衆在政治上初步覺醒，開始尋找道路，他們已開始左傾，但他們的反抗尚限制在和平與合法的範圍內；二、工人階級開始抬頭，但在政治上尚未發言，尚未有一個真正代表其利益的政黨，其鬥爭尚未構成對有產階級的嚴重威脅；三、中國共產黨遠離着城市，同時主張階級合作，倡言改良，向『民族資產階級』伸出了手。這三個條件造成了一個合法和平的反國民黨運動，這運動恰恰投合了一些不滿意國民黨統治的中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甚至一部分不在位的國民黨的軍人政客。

可是很顯然，這樣的條件是易變的，暫時性的。運動如果不中途夭折，那末稍一前進，情形就會兩樣的，中間派的社會基礎很快就會縮小起來，牠的政治運動很快就分崩離析，而『民族資產階級』將首先從這個運動中退開去。

我們說中間派的領袖『民族資產階級』將首先脫離中間派的運動，那是很少與民主派人士的操守或氣節有關的。這是階級關係，是階級鬥爭，個人的性格在此地起着不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們雖然對於民主派某些個別的戰士表示着尊敬，却必須指出『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立場上的弱點。由於我們在上文所指出的這個階級的地位使然，牠之參加到中間派的民主運動中來，與其說是領導這個運動，倒毋寧說是來控制這個運動，利用這個運動的。他們所以要這樣幹的原因，只是因為他們被屏於金融官僚買辦的集團之外，不得不用略左的姿態來要挾一下吧。將來，他們或者控制了這個運動，或者業已利用了牠而得到了相當讓步，那末這個『民族資產階級』都會與國民黨立即妥協的。

中間派的人士會覺得我們這估量太洩氣，太不尊重『民族資產階級』嗎？那末他們的政治意見便是我們這估量的最好證明。依施復亮先生說，他們的基本立場如下：

一、對內方面：『一切政策必須能照顧到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尤其不能超過今天民族資本家所能接受的程度；』二、對外方面：『支持聯合國；』三、行動方面：『應當是和平的改良的。』

這短短三點已經說得明白了：絕對『不能超過今天民族資本家所能接受的程度』，換句話說，『民族資本家』的利益至高無上，一切應該爲了『民族資本家』。再換句話說，中間派的廣大羣衆，應該替民族資本家爭取利益，保障利益。如果不能遵守這一條『政綱』呢？『民族資本家』就要請他的『敵人』國民黨來鎮壓了。

對外方面，中間派在美蘇之間不作左右袒，他們主張『支持聯合國』，聯合國是什麼？一句話，是美

受大小地主們剝削和保甲制的壓榨，農民們拿到這張美麗的支票，自然是特別興奮，額手相慶，以為從此可以過溫飽生活。『勝利』給我們的幸福呀！

可是事實不是這樣，『二五減租』仍舊不能名副其實的實行，大小地主們握有種種權力上的便利，居高臨下，來威脅欺騙農民，他們利用土地私有權的權力，恫嚇佃農收回佃權，留待自己僱人耕種，否則，另訂新約，租額不減；還有增加租額，現在每畝租額有二百六十斤，有二百八十斤，甚至有三百斤計算的（佃農每畝早稻只能收穫一百五十斤至二百斤，晚稻亦僅如此，每畝早晚平均收穫可得三百五十斤，而早晚稻二次都照二五減租，以二百六十斤租額計算，則每畝須繳租額一百九十五斤；若照二百八十斤租額計算，則每畝須繳租額二百十斤；以三百斤租額計算，則每畝須繳租額二百五十斤）。租額越大繳租穀越多，這樣名義上所謂『二五減租』，實際上是一張空頭支票罷了。

至於停徵公糧穀（積穀）更是滑稽之至。積穀停徵了，其他捐穀又像雨後春筍似的提出來了。例如：什麼『文化穀』呀！『事業捐』呀！『房警捐』呀！『戶口捐』呀！『壯丁捐』呀！『縣平購』呀！『軍米』呀！及其他臨時捐等不勝枚舉。這樣的苛捐雜稅，農民每畝共得繳納一百餘斤，這與繳納公糧穀沒有兩樣，不過把公糧穀化整為零罷了。

其尤甚者，莫如把分類雜捐收去之後，再要農民追繳公糧穀，使農民忍無可忍，激成農民之忿恨，致引起八月十日略略鎮農民的反抗鬥爭。茲把八月十二日，甯波時事公報登載略略鎮鎮公所和警察派出所歷迫農民強索公糧穀的經過事實抄錄於後：

『慈谿略略鎮鎮公所事務員翁冠勛，於前（十日）日中午十二時，帶同武裝警察四名，向第一保灣塘農民強收畝穀。當由農民方雲章

國準備進攻蘇聯的一個輿論動員機關吧了。支持聯合國即等於支持美國。支持聯合國即等於反對蘇聯。行動方面的公開標出『和平，改良』，令人想起了甘地先生，他是絕對反對暴力的。如果他所領導的羣衆越出了『和平鬥爭』的範圍，他老人家甯可對敵人『懺悔』，投降，而不肯作『暴徒』的俘虜。國民黨是否比英帝國主義更尊重『和平』些，『民族資本家』及其代言人的心裏是雪亮的。

目前中間派運動尚在形成階段，廣大羣衆還祇是激於國民黨的反動腐敗，含糊地憧憬着民主的前途。但是領導者的『民族資產階級』却是十分清醒的，他們趕緊定下了範圍：『民族資本家的利益高於一切』，『支持聯合國』，『和平，改良』。

興起後的中間派羣衆，一旦踏上了真實的鬥爭道路，能否遵守着領導者的範圍呢？絕對不會。羣衆鬥爭有其自己的邏輯；或者在萌芽狀態就被『自己的』領導者會同敵人將牠摘去了，或者一直發展下去，首先越出領導階級設下的圈子，然後逐步左傾，不斷深化，一直走到現代社會的革命極限，即打擊私產制度，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

中國目前的中間派也逃不出這兩個前途：或者，被上層『民族資產階級』所出賣，中間派羣衆的政治運動在硬壓與欺騙之下給撲滅下去；或者，中間派的羣衆在向左急進的路上，逐層捨棄其上面的妥協分子，以致最後剩着城鄉勞苦小資產者大衆，他們團結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之下，實行社會主義性的革命，建立工農政權，以此根本解決中國的各個難題。可是無論循前一或後一道路發展，中間派要想以一個政治力量獨立地長期存在，都於此證明是不可能的了。

第三種力量的政治形態

中間派這一不可避免的分化，在政治組織上，是否一定分趨於國民黨與共產黨呢？這是不一定的。中間派的上層右翼雖然在政治的方向上與國民黨同路，但若革命勢力澎湃起來，國民黨這個原有的政治組織在民衆眼中顯得太醜惡了的時候，那末一些『民族企業家』，會同了國民黨中的『民主派』，很可能組織一個新的『民主』政黨，有似日本的民政黨與政友會，改組爲『自由黨』與『進步黨』一樣。

下層左翼方面，很可能轉向到共產黨去，同時也有可能形成一種新的政黨，以城市小資產階級爲其主要基礎，藉以蓄積那些反國民黨的廣大羣衆。不過無論前一種情形或後一種情形實現出來，結果還是一樣：解決不了問題，打不開中國所陷入的僵局。爲什麼？因爲就階級基礎說，中國共產黨或類似的新組織都是中間派，都仍是中國農民小資產階級大衆。這些羣衆和大資產階級與地主之間的鬥爭，從一九二七年以來早就表現着了，不管具有多麼進步的意義，但總是沉悶，糾結與無出路的。目前的僵局正是那個鬥爭的結果，而我們今天的任務正是要打開僵局的。

所以必須有個新的力量出來，同時必須有個新的政治組織出來領導牠的鬥爭。這個新力量就是無產階級，這個新的組織便是一個主張社會主義革命的工人黨。

爲什麼祇有無產階級才是新的力量？爲什麼祇有牠才能打開中國的僵局？說起來話長，我們祇能簡單地從兩方面解釋這個問題。第一、由於無產階級的地位與性質使然。因爲在中國各階級中，祇有牠，與帝

、方阿定、張世材、張同餘四人，以公糧穀已奉令一律停徵，不允繳納，並索閱公文。該事務員遂惱羞成怒。迨午後四時，復率領武裝警察十名，臂偵糾隊便衣偵探十名，荷槍實彈，聲勢洶洶，將佃戶翁方周張五家包圍，被拘去方雲章，張世材，張同餘三人，一路拳足交加，帶至駱駝鎮警察派出所。當晚，各農民工作完畢歸家，聞悉此事，俱趕至派出所，願與被拘三人同處罰。當晚，已激動全鎮農民公憤，譴責鎮長翁寶麟，民政幹事何某，暨農會幹事鄭憲章、朱志芳等，強暴逼脅，非法徵收。派出所警長恐激成眾怒，誑騙羣衆，謂被拘之人，概可釋放。羣衆信以爲真，始各散去。詎料該鎮公所及派出所，於昨晨（十一日）三時，將農民方雲章，張世材，張同餘三人帶走，不知去向。昨日午前，農民推派代表來甬，托朱鼎卿律師撰狀，向慈谿縣政府及司法處暨六區專署呈請澈究。

又訊，駱駝鎮公所暨莊橋警察所，駱駝鎮派出所，於本年陰歷六月廿四日，會派武裝警察多名，飭傳農民方阿珍、張莘耕、翁阿察、張同餘、周華成等六人至鎮公所，當予拘禁。旋有該鎮農會幹事鄭憲章，爲見好於鎮公所派出所，勸諭各人須繳納公糧穀。當將六人負責保出。越日，三人合繳三百斤，張莘耕繳八十二斤，周華成繳七十四斤，除呈給周某收據一紙外（派出所所出），而三百斤無收據，待次日午後，鎮長翁寶麟，民政幹事何某及農會幹事鄭憲章朱志芳等，又帶同武裝警察多名再往第一保灣塘地方，挨戶勒迫農民出立單據，共二十九張。該項單據無徵收機關名銜，亦無斤兩記載，祇寫新穀登場如數歸還字樣，顯有弊費

國主義，資產階級及地主完全沒有經濟上與政治上的瓜葛，完全與他們立於反對地位；祇有牠，與城鄉下層小資產階級沒有利益衝突，能够領導他們的鬥爭直到最後；祇有牠，控制着全國的生產與運輸，也就是控制着全國點與線上的經濟命脈；祇有牠，本階級的利益完全一致，隊伍異常集中；祇有牠，憑生活知道了資本主義的罪惡，社會主義的必要。第二、由於中國革命的任務使然。因爲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是要打倒帝國主義與解決土地問題；但要解決這兩個任務，首先要用農工農政權來代替那與帝國主義及地主結不解緣的資產階級政府。誰能爲工農政權而鬥爭呢？當然祇有無產階級了。

農民與城市小資產階級自然是革命的力量，但他們本身既是復合與龐大的一羣，缺乏上述無產階級所具有的任何特點，所以他們祇能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起革命作用，而絕不能起領導作用。

最後我們要談到新的政治組織了。在中國具有長年鬥爭歷史的共產黨，可不可以取得這個資格？換句話說，中國共產黨能否從農民羣衆的黨再度成爲無產階級的黨？對這問題，我們的答覆是否定的。一個政黨的階級基礎不能隨意改變。二十年來始終依靠着農民，迎合着農民，浸透着農民意識；追隨着農民路線，以農民羣衆爲基本幹部，活動於農村區域的一個政黨，即使有些好誠的共產主義革命家佔着領導地位，也不能回復到無產階級的政黨了，何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者，又都已在思想上墮落成三民主義者，蘇聯官僚主義的附庸，服膺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者』了。將來羣衆運動發展下去，共產黨可能移轉一部分勢力到城市中來，也可能去接近工人階級，甚至，我們退一步承認，有可能企圖把自己的基礎重築在無產階級身上，但即使如此，即使中共再度成了代表無產階級的黨，牠還是不能代替我們所要求的那個新的政治組織，即能够率領無產階級及城鄉勞苦羣衆去建立工農政權，藉以完成中國的歷史任務的。

並非每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都能够忠於社會主義，實行社會主義的革命。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同時必須武裝着一個正確的社會主義的革命綱領。否則，牠仍祇能替資本主義服務。所以一個政黨的社會基礎固然重要，但依據着這個基礎，建立一個正確的革命綱領却是更重要的。近代史上不少真正工人階級的政黨，而且也有不少自命爲『社會主義的』，但真能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却祇有列甯與托洛茨基領導時代的俄國布爾雪維克黨。其他如第一次大戰終了時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政權落到了手裏，却拿來鎮壓社會主義的革命，拯救資本主義。英國工黨已經多次拿到過政權，但牠的作用却是替『他們的陛下』服務，唯一出色的地方，只是他們比保守黨服務得更加好些。第三國際轉入了史大林時代的各國共產黨也是如此，牠在一九二五年以後用機會主義幫助德國國民黨走上了政權，一九二六年英國以同樣策略幫助工聯會的工賊們解決罷工問題，一九三三年在德國以『社會法西斯』口號抬上了希特勒，一九三六年法國用『人民陣線』的策略放過了革命形勢，同時期以同樣方法在西班牙便利了佛朗哥哥的胜利。大戰期間，以最壞的民族愛國主義幫助了帝國主義的大屠殺，戰後，牠們又各自以腐敗的改良主義，幫助着各個統治者渡過危機，穩定統治，以此來避免革命，並以此來準備第三次的世界大戰。

中國共產黨在社會基礎上不及法德等國共產黨的純正，而在政策上却與其兄弟們同樣地掉入了階級合作與改良主義的泥淖。整個共產黨的再生是不可能的，牠們再不能自拔於沉溺了二十年的墮落道路了。部分的共產黨員，那些真誠的共產主義革命家，在未來革命的打擊與影響之下，一定會掙脫那無望的史大林

。此次翁鎮長故態復萌，竟囑使派出所警察多名，任意拘捕農民，拳打脚踢，五人被拘時，用洋鎊鎊去，迄今不知下落。」

保甲處之橫行不法，敲詐勒索，已成爲農村中的一種風氣。當鎮長和保長的，像土皇帝一樣，每個農戶人家，要常常孝敬他們，凡有婚喪喜事，或過時過節，都要請他們這般瘟神來吃，或送禮物給他們，不然有什事就要麻煩你。八月十二日洋警鎮第二保某姓喪事，因爲沒有打保長的招呼，請他來吃，竟致觸犯了他，藉口棺材拾過他們舊宅徐姓門口，路徑走錯，犯了徐姓的忌，於是保長徐甫榮，鬧起祠堂門，鼓動徐姓宗族裏的愚夫愚婦，向某姓拚命，要某姓担保三年無事或罰佈事一場，某姓不肯承認，於是勾結鎮長鄭燁景，強暴逼脅，敲索法幣四萬元完事。諸如此類之事，實不勝煩舉。還有鎮保長常常抽頭放賭，騙取一般農民的錢。

農民每年每畝收穀，平均不過三百五十斤，繳了一百多斤租穀；繳了一百多斤捐稅；還要孝敬鎮保長；剩下來至多不過一百五十斤了，再除去秧十斤，人工一百四十斤，還有牛食肥料等等，這樣辛苦一年，還要應本，於是不得已借高利貸。例如，借穀一百斤還穀一百八十斤，二百斤或三百斤；借錢利息二角以十天爲期。農民們飲鴆止渴，越弄越窮了。總之農村裏的農民今日受苛捐雜稅的繁重，租額的高昂，高利的盤剝以及保甲制度的蠻橫壓迫，使農民無日不在水深火熱之中過活。

八月十八日於慈谿

（一）人生觀與社會

主 義

通 信

編輯先生：

我是一個新旗的愛讀者，在此『非揚即擊』的

主義的，但這將不是表示共產黨的再生，而祇能構成中國新的革命黨的一部分基礎。

要領導中國無產階級從事鬥爭，要領導這個鬥爭去打開目前中國的僵局，要發展這個鬥爭走上社會革命的途路，并最後達到勝利，中國必須建立一個具有正確的社會主義革命綱領的工人階級的新黨。一切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甚至徹底的民主主義者，都必須團結在這個黨內，站在他的旗幟之下。祇有這樣的政治集團才是目前中國迫切需要的第三種力量。也祇有這個力量才存在基礎，才有發展前途，才有勝利把握。這個力量的位置顯然不介於國共二黨之間，而處於共黨之左；不是中間派而是左派。

左派政黨的形與核心

這樣一個左派，倘就完成的組織形式言，中國還沒有存在；但就政治思想說，牠却久已存在了。上面我們說過，當中國共產黨離開城市轉向農村的時候，黨內有一個左派，以中共的創建人陳獨秀爲首，堅持着原來以城市無產階級爲主要基礎的革命路線，并且接受了第三國際的左派，即托洛茨基派的政綱，成了國際左派反對派的一個部分。二十年來，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經歷了最深刻的機會主義的墮落。牠由世界革命的總參謀部，一往不復地變成了民族的，階級合作的，擁護資本主義的改良政黨。這中間唯有牠的左派，在一九三三年以後獨立存在，在一九三八年以後正式稱爲第四國際的，始終信守着共產主義的傳統，始終忠實於十月革命的遺教。因之，在目前世界上，祇有第四國際才是具有正確的社會主義革命綱領的工人階級的黨了。牠分享着世界工人階級的悲慘命運，渡過了反動壓迫與戰爭摧殘的黑暗幾年，現在正在全世界發揮其力量，成爲社會主義革命的指導者。這個國際運動的中國分支也經歷了同樣的過程。牠因中國工人階級的退出政治舞台而陷於衰弱無力，牠忍受了國民黨和日本帝國主義的雙重屠殺與迫害，但雖如此，牠却始終高舉着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大纛。

如今全世界是處在完全毀滅或社會主義勝利的抉擇中，中國的命運尤其要在這個抉擇中受到決定。中國如果不經由一場徹底革命而建立了工農政府，由此而解決一切對外的難題，則行將毀滅人類的第三次大戰，多半要把中國首先毀滅。因此，我們可以說，要救中國，也正像要救世界一樣，必須有一次徹底而廣大的社會主義革命，但要實行這種革命，必須有一個能領導這個革命的黨。可是在中國現有的諸黨派中，唯一主張社會主義革命的，却祇有第四國際的中國支部，即十八年前由中共派生出來的所謂『托派』，亦即『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所以這個組織，在未來中國新的革命黨的形成上，一定要佔着核心地位。至於共產黨以及民主同盟則不能起這個作用，因爲他們所代表的是中間道路，也就是過渡道路，在未來的真正決鬥中牠們如果不站在社會主義革命的政黨方面，必然要回到十足反動的資產階級政黨方面去的。就上層說，這些『中間派』的右傾與反動是必然的，我們不能對他們存什麼幻想。不過就下層的羣衆說，『中間派』的龐大恰恰表示出革命局勢的來臨，任何革命少了他們是不能成功的，所以對於這些人，我們應當寄以莫大的希望與同情。我們應該藉行動與言語之助，讓中間派的廣大羣衆覺悟到他們所希望的民主和平，土地與民族獨立等等要求，祇有靠最左的方法，即由工人領導的社會主義的革命才能獲得解決與保障，這個覺悟將引導其中最優秀的一部分，來參加社會主義的革命黨，並團結其中最大部分於那個革命黨的周圍。

環境下，你們的立場是頗值得推崇的。

從來，我是有一個一己的所謂人生觀的，但新旗的文章却把牠全部動搖了，然而又不曾帶給我新的，於是我心裏反而空虛起來。對於這一點，希望你先生能有以教我。

此外，讀了新旗的文章，我有一些零碎感想，寫出來給你看看，並希指教：

一、第四期上『菲列濱果真獨立了麼』一文中，蘭因先生說『菲列濱在軍事上和經濟上是沒有獨立的，不過政治上獨立罷了。』這點，據我所知，連政治獨立都談不到的。現在總統羅哈斯是一個會經附逆的分子，由於麥克阿瑟之全力支持，才能擊敗人民所擁戴的奧斯敏納，而登總統之寶座，這樣政治獨立在那裏？

二、我最喜觀看的是『革命問題漫談』。

三、第四期的短評：『六二三』的教訓，最有力。

四、在可能範圍內，希望介紹一些初步的，有系統的理论。

五、『國大問題』。貴利認為要打破目前的僵局，『應當要為一個直接平等不記名普選的全權國民大會而鬥爭』。我懷疑『普選』的可能性。即使這理想能實現，技術上困難還大得可以。

言保珍上八月廿三日

你說你的人生觀給新旗的文章打破了，不知是怎樣的人生觀？新旗文章如果打破了你的舊人生觀，我們想，那末，也能給你一個新的。因為新旗所有的文章祇代表着一個思想；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照普通人的見解彷彿祇是一種政治理想，其實不然，牠是完完整整的一個人生觀。做一個革命的社會主義者，不僅在政治上抱着一個確見解，而且在人生態度，

讀者論壇

從田賦說到土地革命

大化

自從抗戰以來，中國的田賦逐年都在增加，沒有一年停止過不增。如果田賦所徵收的是貨幣，我們尚可以說因為法幣的貶值，田賦的增加是當然的。可是自從開戰不久，我們的政府早就把田賦改徵實物，那麼，田賦增加一分，老百姓的實質負擔也就加重一分。在戰事未停之前，我們尚可替政府解釋說，由於戰費的需要，不得不取之於民；中國人民為尋求獨立，求生存，必須犧牲。可是現在已是停戰後的一年了，我們仍舊看見田賦在增加。前些年時候報上曾載着說今年的田賦是每畝徵四斗，借四斗，外加縣政公糧一斗二升。計算起來每畝至少一共要繳九斗多。這個數目的高得驚人，是任何人都會感覺到的。以我所知，中國的水田，以上等的計算，大致上在豐年也不過只能收到三石多稻。下等的水田就是在豐收的時候也還收不到兩石。這還是平時的情形。這幾年來，因為戰爭的影響，鬧得農民不能安心耕種，人工不夠，肥料不夠，田地的收成可以說普遍的減少，大約上田的收成只抵得上平時的中田，中田的收成只抵得上平時的下田，至於下田則多半因為耕種不合而被荒廢了。那麼，以未荒廢的田地拿來平均一下，每畝的收成在豐年不過兩石多。再拿豐年常年和歉年平均一下，每畝的收成不過一石多。現在政府的田賦就要九斗多，那麼農民終年忙碌，貼種子，貼肥料，結果就只剩下幾斗一畝了。

現在限着今年的田賦就要開始徵收了。政府的田賦負責人前天雖在報紙上發表談話，否認每畝九斗餘那樣的高額，但是他仍承認每畝須徵四斗餘。拿這個數目來說，大約要占總收穫的三成。我們政府處處主張復古，主張恢復固有道德，惟獨在壓榨人民這一點上，他是一點也不顧到什麼固有道德不固有道德的。論語中有一段記載：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意思是說魯哀公因為年歲荒歉，費用不足，於是向孔子的弟子有若問計，有若勸他實行十一稅法（即農民收十成，公家抽一成），哀公認為，十成抽兩成尚且不夠，十成抽一成怎麼行呢？……從這段記載看來，十成抽兩成古人已認為多，而目前的田賦已經到了十成抽三成的程度，我們的政府當局似乎還不以為重的。

而且從上面所引的那段論語看起來，既說『年飢用不足』，則在年不飢（即不荒歉）的時候費用並無不足可想而知。由此，我們可以想到古人的十一稅法或十二稅法乃是真正的十一稅法或十二稅法，當年歲歉收的時候，公家所抽的，乃是按照歉收的數目抽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二。正因為如此，所以年歲荒歉公家的收入也減少，因而不够使用。可是現在的情形怎樣呢？十分之三的田賦乃是按平年的十分之三。縱遇到年歲荒歉，田賦也仍然按照定額徵收，毫不減讓。官老爺那裏會管到你們小百姓的死活？事實上，我這幾年來在鄉間看到的，不但歉收時錢糧不會減免，甚至荒廢的地田，也必須照冊完糧。

照我們政府的高級官吏想來，十分之三的田賦也許不能算多。因為他們或許想到地主所抽的地租數目

一般思想的各方面，都必須有一個與眾不同的社會主義的立場，社會主義者不能同時是信神者，也不能同時是個厭世主義者或退化論者。

社會主義是一個完整的人生觀，牠根據着最現代化的科學的宇宙觀，根據着辯證唯物論的哲學體系與歷史見解，他無論對於宇宙，社會，人生，歷史，都有一個獨特的立場，這些立場構成了一個社會主義者的人生觀。

所以做一個社會主義者，必須接受現代科學的成果，排斥一切迷信與宗教；必須認識世界以及社會的進化之跡，必須了解現代社會構成的法則，而且，必須與那為較善世界的鬥爭聯繫着，確定一個人的道德標準。

我希望你能够造成這樣一個新人生觀。要造成這樣的人生觀，自然，光靠新旗上的文章是不够的，得研究些別的更基本的書籍。

第四期上的『菲列濱獨立』一文。若光憑你引出的話看，自然是錯的，菲列濱政治上也不獨立。不過文中接着說：『軍事上和經濟上沒有獨立的國家，政治上果真能够獨立的嗎？』意思是很清楚，政治上也不獨立的。

喜讀『革命問題漫談』好極。理論比事實解釋是更基本的。我們對國大問題的態度，在第五期裏的『概結』一文中，說得相當清楚。我們『並非看重牠是一個完美的機關的靜的方面，而是看重 能喚起廣大鬥爭羣衆』政治覺醒的動的方面』。換句話說，我們所要的國大能否實現是一個問題，但在此時此地爲此而鬥爭，却可以推進歷史，推進鬥爭的。因此我們提出。對此問題，本期三男君一文又有比較詳細的解釋，請參閱。

編者

比這還多。中國的地租，最重的地方有超過十分之五的。既然佃農能負得起十分之五的地租，那麼，現在政府把自耕農也當作政府的佃戶看待，以田賦的形式來向他徵取地租，似乎是應該沒有問題的啦。至於真正的佃農，則政府想，他們並不負完糧的責任，負責任的是地主，所以照理不會受增加田賦的影響。

想像上的道理雖然是這樣，但中國鄉村的實際情形決不是這樣。農民和土地所有者所担負的決不止那幾斗的錢糧。他們所担負的甚至有正式錢糧的幾倍。駐軍來借糧要柴，是沒有間斷的。（糧曰借，柴曰要，似乎借了會還，其實是沒有還過的例子。其所以稱爲借者，不過因爲國家明定有口糧，不好再說要耳。）過年過節地方要籌款犒勞軍隊，軍隊開拔，地方要湊份子歡送，新來了軍隊，地方要辦酒席歡迎。軍隊沒有合式的住處，要地方籌錢蓋房子，不但要蓋房子給軍隊住，還要再另置一次。地方上有土匪，軍隊出動，土匪沒有打死一個，子彈的消耗却非要軍主或地方担負不可。地方上今天派差，明天派兵。如果派到你家，你家沒有能應差應快的人，或者正值農忙抽不出工夫，就只好花錢請人代替。有時花錢也請不到人，就只好把錢交給保甲長，托保甲長代請。這樣一來，當然又替保甲長開闢了新的生財之道。其他諸如此類的事情，真正說不勝說，例如鄉保長做生日要恭賀，保甲經費和其他一切地方上的開支都要農民負擔。總共起來，農民除了繳地租，應快役之外，每年每畝大致還要開銷一石上下。

農民既受到這樣的榨取，當然生活是苦到了極點。他們實在已經到了絕境。真正籌措不出來的時候，當然就只好準備坐牢吃官司。但是現在的官司却不是若于法學家們所想像的那樣容易吃。如果法律上有明文規定不繳錢糧或不繳某項公費該判徒刑幾年幾月，那麼中國農民恐怕十個就有九個情願願棄田地不耕讓官廳判他們的罪了。事實並不是那樣。在鄉間，如果鄉保長或駐軍派到你該出某項費用而你不出，最普通的辦法就派槍兵把你拘捕帶到鄉公所或兵營裏押起來。並無所謂按『法』究辦。高興怎樣拷打你，就怎樣拷打你。如果你家裏沒有飯送來當然就只有挨餓。一天不送來餓一天，十天不送來餓十天。晚間即幸而沒有被吊起來，睡的还是連稻草也沒有的濕土地。真是最苦的叫化子也不如。叫化子大抵還有一把稻草過夜，還可以有向人乞討的自由，而中國鄉間的農民個個有預備着做原始社會囚犯的情形。

以上是農民一般的生活狀況，至於佃農，情形當然更壞一點。他們除了上述的担負之外，還要繳地租給地主。在雙重榨取之下，當然是比自耕農更苦。但是一個人總是要設法活命的。到了真正拿不出來的時候，按照事物的常理，他們自然會向抵抗力較弱的方面尋找出路。地主和官吏比較起來，自然是地主比較容易對付。因此，在過重的雙重榨取下，公家的費用既無法推脫，當然就只好在地租方面來求減輕。我的家鄉情形來說，這幾年以來，那怕是極上等的田，也沒有能照約定租額收租的。田地差一點的，因爲耕種不好，當然就只好任其荒蕪。這樣一來，地主中間當然有好多陷於破產。在中國，從幾年前起就流行着一句諺語：『往日日是當字腳，今日出爲累字頭』。

城市裏的工人，商人或公教人員，如果沒有到過鄉間，或者與田地沒有關係，只看了上面的敘述，也許還不能了解何以田地會變累贅。他們想，地租雖然不能照定額徵收，縱令減讓，大約總不會不繳錢糧罷。其實可怕的倒不是正式的钱糧，而是正式錢糧後面跟着的非正式錢糧。關於糧吏用加一大秤收糧，故

(二) 中立與是非

編輯先生：

我是一個沒有黨派關係的學生，不過我也看不慣那些自命爲中立者。我覺得祇要是一個中國人，就不能對中國的事中立，因爲中立與旁觀是相去不遠的。我看不慣中立的另一原因，就是這名稱往往是一個幌子，越是喊中立，而骨子裏却越是有黨派。

我覺得，在這個時候，超出於既成黨派是可以的，甚至是應該的，但對於這些政黨之間發生的糾紛無所謂中立，而祇應站在超黨派的立場上，即不站在糾紛有關的任一政黨的立場上，評斷一個是非；但不評斷，我們還應該積極站在是的一方，參加鬥爭，以反對非的方面。

你們的態度我很贊成，雖然你們不是無黨派的。你們不屬於國共二黨，超出於二黨，但不中立，有是非。你們抨擊國民黨，同時也批評共產黨，但你們顯然不將二者看成半斤八兩，顯然有所高低，有所偏袒。你們對較爲進步一邊的批評，只是爲了更進步，以更有力的打擊反動。這個立場，我是十分擁護的。

最近我看到一本雜誌，是專門給『青年與婦女』看的，有些態度跟你們差不多，但有些態度却很成問題，例如在第五期，牠在一篇論內戰的文章上，說過國民黨如何不好之後，接着作者彷彿爲要暗示『中立』，說中共的行爲是『憑藉武力形成割據的軍閥姿態』。這個我覺得太不對。批評雙方是應該的，但不能把是非顛倒了。我們知道，內戰總以區域形式進行的，我們能單憑這個形式而指較爲進步的一邊爲『割據』嗎？『軍閥割據』這類字句，不管應用的人心裏懷着什麼想頭，我覺得，總

意和納糧人才難以取得小費等情形，已經是許多報紙所宣布過的。除此以外，地方以防匪爲名購買槍械所費要向田畝上攤派，爲防匪築碉堡所費要向田畝上攤派，地方經費缺乏要從田畝上籌措，而最可笑的莫過於『催征人』的催征費，最可怕的莫過於軍隊的採購軍糧。先說催征費，國家的錢糧既非常緊要，糧戶們那裏還敢不按時籌繳，要等到糧吏的催促？即使是聚糧吏催促，則糧吏既爲國家官吏，自應由國家支領薪金，可是事實上所謂催征人並無其人，不過由保長兼掛催征人名義，只是到期把糧單分發各糧戶（或糧戶的佃戶），就要按畝收取催征費三斤，如果一保中有糧田三四千畝，那麼當保長的單靠催征費一項每年就可以有一萬斤稻的收入。無怪鄉間的保甲制度糟到一塌糊塗了。

所謂採購軍糧，不外是第二種錢糧，而且數目較錢糧更重，催逼起來比錢糧更兇。既說是採購，當然要按市價自由買賣才是正理，可是老百姓自己已經沒有吃的，而且明明知道軍隊難纏，誰個願意出賣。於是我們的軍隊就想了些辦法，是按田攤購。每畝攤你多少，你就非賣多少給他不可。那怕你家裏沒有米吃，那怕你必須買米來寬給他，讀者或許以爲：既是採購，當有代價，那麼老百姓得了代價之後，豈不可買米。如果有人這樣想，那簡直是對於中國事未免太隔膜了。所謂採購的實情是：先出告示宣布採購數目，規定官價，限定納繳日期。然後是層層催繳。等待米糧納齊了，再慢慢等着採辦機關一層一層去請求價款，等到價款請下來，通過地方機構發到農民手裏，物價早已漲了幾倍，幾十倍。就這這種跌價幾倍，幾十倍的代價，也往往還爲中間人吃去，不能到達農民手裏。所以名爲採購，實際上等於無代價徵用。

我在這裏且舉一個例子。民國三十年那一年，恰值皖南豐收，那時上官雲相在皖南主持軍事。他向中央建議說皖南宣城南陵兩縣是產米之區，接近敵人，如不設法收糧後運，就很有被敵人來搶去的危險，於是宣城南陵就舉辦所謂『搶購軍糧』。本來上面規定的是每畝徵購額以八十斤（老秤）爲限度，但是實際上攤派的數目竟有超過一百斤以上者。糧價規定的是稻每百斤（老秤）十三元，可是實際上這批糧包給糶坊做成糙米，糙米又雇人後運，做工和運費都是要從代價上扣除，結果稻每百斤實得代價是八元至十元不等，而這筆錢發下來的時候，稻子市價已漲至每百斤四十餘元。農民所得不過四分之一乃至五分之一。而多數鄉裏老愚連這賤了值的鈔票也沒得着。因此老百姓說：什麼『搶購』？簡直就是『搶』！

光拿軍糧一項來說，除了非正式的『借』糧不說，還有三種，一種是隨糧帶徵的『徵糧』，一種是上面所說的『搶購』，一種是『採購』。名稱雖不同，實質並沒有多大差別，歸總一句話，就是老百姓把辛辛苦苦耕種出來的稻米都無代價貢獻給政府，實際是第二種田賦，第三種田賦，第四種田賦。拿隨糧帶徵的『徵糧』來說罷，這是中央規定適用於全國的辦法，照理應該可以辦得比較好些，可是皖南有若干地方於三十二年隨糧帶徵的軍糧代價，一直拖到第二年秋收都沒有音訊。老百姓跑到縣政府去問，他們總說上面沒有發下，實際上情形如何，老百姓是無法知道的。

照這樣的情形，有田地收租的人，自然是無法指望剩點什麼，有時候把所收租糧完全交把公家還不夠頭。以皖南宜南兩縣情形來說，在平時，上等田的租額大約是每畝老秤二百斤，中等田大約是一百四五十斤，下等田大約是百斤上下。現在下等田已完全荒蕪，中等田大致都減低租額至百斤以下，上等田租額雖未甚減低，但是因爲農民已凋敝達於極點，無力繳付，所以地主在實際上能收到的，像去年那樣豐稔的年

只能助長反動黨的聲威，替牠吶喊，不知先生以為如何？

管佩秋上 九月一日

佩秋先生：

來信所論，極是極是。關於中立與是非之分，我們不想添說什麼，有一點需要補充的，就是中國人不但對於中國事不能中立，就是對於世界事也不該如此。天下已成一家，『中國事』大部分是決定於華盛頓的，你看。

中立本來是一個騙詞，在此階級分裂的社會裏，真正中立不能有，也不會有。至於是非，那是有的，原因就在於階級中有進步與反動之故。

國共間事，首先也應該就二黨所代表的階級立場來判斷。一邊一記目光的辦法自然不正確，幫着較反動的（就階級立場說）一邊來反對較進步的一邊當然更不該。

來信所指那本雜誌上的話，我們找出來看了，這話自然是錯的；不過我們希望文章的作者祇是犯了字句上的毛病。

編者 九月十日

八月十五日，北平有個盛大的晚會，慶祝去年日本的投降。主席胡適演說中洩露了過去一件外交秘密。他說，當他初到美國就大使職時，正是中國最危急的日子；廣州和武漢兩大城市於數日之內相繼淪陷了。奉命向美國交涉借款的陳光甫，垂頭喪氣，不僅沒臉向白宮談判借款，而且沒臉出門去館子吃飯。他打電話給新大使，說要到大使館來吃晚飯。可是飯前，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打電話來了，要請他們二人去他家裏吃酒。九點鐘，胡陳二人到了摩

頭，也只合到定額的七成。中田在減租之後仍不能照額實收。因此我看見國民黨政府當局在宣傳什麼『二五減租』，心裏不免好笑，這樣的口惠，當然是樂得你們做的。其實農民早已被你們壓榨到連七五租也吃不起了。

所謂地主能實際收得的田租究竟有多少呢？以皖南的情形來說，豐歉平均計算，大約上田每畝可收百斤，中田六十斤，下田無收。上中下三等田再一平均，大約每畝可以收到六七十斤。這個數目大約是够完正糧，再遇着軍隊有何攤派，那麼地主就只好丟下田地逃跑了事。當然也有少數不跑的地主，那就是地方上的土豪劣紳，和鄉保長駐軍勾成一氣，通同作弊，以多報少，『飛糧』『過戶』（把自己應納的糧轉到別人身上）。可是多數守本分的地主是不能仿效這樣做的。去年我在蕪湖，和一個親戚在馬路上走，遇見一個形似光蛋（孺三）的人，我的親戚指給我，問我認識不認識。我說不認識。他說那是××茶葉行的小老板，家裏有幾百畝田，現在跑到蕪湖來當光蛋。言下大有鄙視之意。××茶葉行平時在宣城是相當有名的老字號，這幾年因為茶葉生意蕭條，而田地又無收入，那麼那位小老板之流落為光蛋，自是可以理解的。我當時心裏想：流落為光蛋雖表示一個人的無用，或有什麼嗜好，但是至少還表示他沒有同流合污，現在能够同流合污的人是個個有辦法的。

我有一個親戚家住皖北，有一點田地收租。據他來信，這幾年不但租收不着，還要倒貼各種經費。今天才設法把經費付清，過了幾時又累積得許多拖欠。因為他是個古老人物，把祖業看得非常寶貴，所以雖然賠累仍舊捨不得丟棄。結果是積欠愈來愈多，終於不得不把田割賣一部份來清理積欠。到後來佃戶也跑了，保甲長仍要他担認派費，他一再托人向保長交涉說田都荒了那裏還有方法担認派費。保長說，只要有莊房存在，上面是不許報荒的。弄得沒辦法，只好就把莊房也拆了。

像上面所說的這兩個例子，乃是鄉間一般情形，並不是特殊例外。中國的農村裏，不僅小農不能生活，就是地主，除了與官更軍隊勾結吃人的，同樣也不能生活。這當然是國民黨政府極度榨取的結果。可是國民黨為避免自己的罪惡，現在還在假宣傳要減輕佃農的負擔，限定地租不得超過正收穫量的三成。好像鄉村農民的不能過活都怪地租太重。其實照上面所說，地主所能實收的地租平均也不過恰合正收穫量的三成，而國家向地主徵收的，且田賦一項已經就有此數了。

我說地主領有田地並無實益還有一件事可以做鐵證，那就是田地的跌價。在中國鄉間已經有一個普通情形，那就是下等地地絕對無法出售。只有上等田地還有買賣，而它的代價，和一般物價對比起來，只合到平時的五分之一乃至十分之一。我想起了一件故事。宣城東鄉雙橋鎮和孫家埠附近的田地，是宣城出名的良田。前幾年川軍到宣城駐防，有一位蕭軍長看中了雙橋那塊地方，就派了一個副官，他的宗家，住在雙橋專門替他買田。川軍調防之後，這位蕭副官仍留在雙橋繼續他的『任務』。前後一共買了幾千畝，在雙橋鎮上專門設了一個倉房。過了兩年，錢糧漸漸加重，收租漸漸困難，蕭軍長看見形勢不好，發了一道命令給蕭副官：租額在二百斤以下的田一律賣去。這個故事是宣城人個個都曉得的。由此亦可以推知，除了極好的田地，尚可有一點收益的希望之外，大部分的田地是難望有收益的了。

記得前年（三十三年）度的田賦軍糧（單指中央規定的軍糧）合共是三斗幾升，折老秤五十幾斤，已

根索家裏，看見財政部次長和兩個顧問都在那兒，才知道是一個『鄭重其事的會談』。會談些甚麼呢？原來羅斯福總統已經批准中國借款了。廣州和武漢淪陷，中國兩位外交官認為淪陷向美國開口之時，美國居然不待開口就答應借款了。真是『一個出乎意料的消息』，如胡大使說的。可是，摩根索還有下文。今晚，他不僅通知總統批准借款消息，而且要求中國政府保證：抗戰到底。胡陳二人快活得連酒也不吃了，立即回去打電報取得這個保證。保證，自然是沒有問題的。借款是以抗戰到底為交換條件。說了這件外交秘密之後，胡適做結論說：『這故事深刻的留在我的腦子裏，同時也很感謝着美國對我們的偉大同情與援助。』好一個疏財仗義不圖私利的俠客呀！

強耕種而得的結果仍被強力者收奪而去。這幾年來工業既大部停頓，海關鐵路等收入既完全消滅，可以說從黨政軍各機關起，到奸商高利貸者地主土豪地痞流氓止，沒有一個不是寄生在農民身上的。而造成所有這些現象的關鍵乃是國民黨的反動統治。

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不僅榨乾了農民，而且也排擠掉那些單純的地主，即不做土豪劣紳，不當鄉保長，不勾結黨棍和駐軍的地主。因為這種地主由田租所收入的還抵不上因田地而支出的。中國農民實質上已經變成一種變相的農奴，他們的生活可以說連真農奴也不如。統治舊農奴的是個個的封建領主，而統治這新農奴的乃是以國民黨為核心的，一個很複雜的集團。封建領主靠身份制度把舊農奴束縛在土地上，而國民黨却發明了保甲制這個枷鎖。中國農民當被壓榨得實在不能過活的時候，是連逃離的自由也是沒有的。國民黨政府雖沒有宣佈沒收農民和地主的土地，但實質上比沒收一切土地而自命為封建領主還要利害。正式宣布沒收土地而自命為領主，還不能照現在這樣向農民無限制的苛求。如果苛求很了，農民還可以來一個『罷耕』相對抗，如同佃農向地主辭佃一樣。現在國民黨並不宣布沒收土地，為的是一方面要避免土地私有者的反抗，一方面還可以靠此利用農民落後的私有心理驅使他們更加緊出力勞作，好讓國

經弄得皖南的老百姓叫苦連天。去年抗戰勝利，中央宣佈免田賦一年，有出地的才慶幸可以鬆一口氣，接着又來了要命的消息：縣政府因為經費無着要向地方籌措，地方駐軍要採購軍糧，尤其是當去年初勝利的時候，所有皖南贛東北的軍隊都經過甯國宣城向蕪湖方面推進，宣城成了重要的兵站，所以單獨攤派的軍糧一項就是每畝糙米四斗，折稻約合九十斤。老百姓被逼得上吊投水者日有所聞，至於逃亡異鄉者更是不知多少。可是這樣的事實我們的中央政府都裝作不知道似的，以為免賦便宜了老百姓，今年又宣佈要分兩年補徵。其實，非正式錢糧早已超過正式錢糧兩三倍，不補徵正式錢糧，老百姓已難活，那裏還架得住你再來厚賜！

抗戰這幾年來，許多人都慶幸老天爺替中國幫忙，沒有讓中國發生水旱天災。想起來，中國這幾年誠然一點天災也沒有，但是人造的災荒却超過了近幾十年的最嚴重的天災。據各報所載去冬今春各省在饑餓中的人民，恐怕遠超過民國初年北五省的大旱災和民國二十年長江流域的大水災。只湖南一省據說就有五百萬人要餓死。雨水順調而有這樣的災荒，究竟為的是什麼呢？我們政府的解釋是敵人進擾，使老百姓無法安種。但據說敵人所佔據的是『點』和『線』，既然是點和線，照理老百姓就有法安種。其實擾害老百姓安種的，與其說是佔據點和線的敵人，甯可說是那占據『面』的豺狼。中國災荒的真實原因是：（一）在不良的政治下，田地大量的荒蕪，不但下等的田地全部無人耕種，就連中上等的田地有時也局部荒蕪。（二）未荒廢的田地也因失役，壯丁及其他種種關係不能照平時一樣細耕，因而收穫量普遍減低。（三）農民為着活命，在極壞的情況下勉強更多榨取一點。我說中國農民生活不如農奴，一點也沒有誇張，農奴雖沒有獨立人格，但是縱令被當作和牛馬一樣的『財產』，領主們也還要供給他們以一定的衣食，可是現在國民黨是決不會顧慮到農民的死活的。

整個的農民（不管是佃農或是自耕農），和單純地主的遭遇既是這樣，我以為一個革命的黨要解決中國的田地問題是有路可尋的。他可以爽爽快快地布沒收一切土地歸國有，分配其使用權於一切能耕種的人，而徵收較輕的田租就是了。並不須要顧慮地主的反抗。單純的地主，在國民黨統治下，雖在形式上保留着土地所有權，而實際上早已得不着實益，所以對於土地國有是不會有什麼強烈抵抗的。至於那些與黨政軍當局或土豪流氓勾結的地主，雖不沒收他們土地，他們也勢必要盡量反對革命，反正是革命的敵人，我們更應該堅決鏟除他們的根基，不應該和他們妥協。中國共產黨應該從中國農村中這些具體條件來決定他們的土地綱領，應該大膽地舉起土地革命大旗來。

本刊本期因中秋節及其他關係，遲出九日。以後統改為每月十日及廿五日出版。

中國革命悲劇(續)

第二章 新覺醒

當一九一四—一八年世界大戰中間，中國經濟開始改變時候，其他各種改變也很快地接踵而來了。新觀念，新思想，新要求，經過千百條孔道進入中國來，好像強有力的潮水一般衝擊着過去時代的破船。在知識分子中間，一九一一年革命失敗所造成的失望和頹喪情緒已在消失而開始一種豐富的文藝復興，很迅速地吸引整代的青年人走上牠的軌道。一九一一年前後活動的知識分子羣中出現了陳獨秀，安徽省官僚家庭的子弟。陳獨秀比他以前任何人都更大胆，更勇敢，更明確，倡導反抗。他的周圍團結了一大批人，他們將跟他一起支配整輩人底生活，以後又將分化為敵對營壘，在社會戰爭場地上各自率領大軍作戰。

陳獨秀宣告說：「新青年底任務乃在於『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舊藝術，舊宗教，國粹和舊文學』。他提出『德謨克拉西』(民主)和『賽因斯』(科學)來代替上述種種之位置。

一九一五年，陳獨秀在他主編的有名的『新青年』雜誌上寫道：『我們求社會進化，不得不打破『天經地義』『自古如斯』的成見；決計一面拋棄此等舊觀念，一面綜合前代賢哲當代賢哲和我們自己所想的，創造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的觀念，樹立新時代的精神，適應新社會的環境。我們理想的新時代新社會，是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希望那虛偽的，保守的，消極的，束縛的，階級的，因襲的，醜的，惡的，軋轢不安的，懶惰而煩悶的，少數幸福的現象，漸漸減少，至於消滅。』(見『新青年』第七卷第一號『新青年宣言』。譯者按此文係一九一九年所寫，並非一九一五年。)

陳獨秀又寫道：『予所欲涕泣陳詞者，惟屬望於新鮮活潑之青年有以自覺而奮鬥耳，自覺者何？自覺其新鮮活潑之價值與責任，而自視不可卑也。奮鬥者何？奮其智能，力排陳腐朽敗者以去，視之若仇敵，若洪水猛獸，而不可與為隣，而不為其菌毒所傳染也。嗚呼，吾國之青年其果能語於此乎？吾見夫青年其年齡而老年其身體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齡或身體而老年其腦神經者，十之九焉。……循斯現象，於人身則必死於社會則必亡。欲救此病，非太息咨

嗟之所能濟，是在一二敏於自覺勇於奮鬥之青年發揮人間固有之智能，決擇人間種種之思想，孰為新鮮活潑而適於今世之爭存，孰為陳腐朽敗而不容留置於腦裏，利刃斷齧，快刀理麻，決不作牽就依違之想，自度度人，社會庶幾其有消甯之日也。』(見『新青年』第一卷第一期『啟告青年』)

這種令人難忘的號召乃是中國新覺醒之先聲。有個大學生回憶道：此文發表，『好像一聲霹靂，將我們從漫長的迷夢中喚醒。……我們寄快信到北京去多買幾本。我不知道這雜誌第一號究竟重印了多少次，但我確知牠賣銷了二十萬本以上。』(見Fai C. Wang著的『中國青年運動』，一九二八年紐約出版，第一〇〇頁。)(譯者按，此言不確。『新青年』雜誌大銷行是在五四運動以後，第一卷第一號出版時幾乎是不受人注意的。)(從此發生了偶像破壞運動，青年人勇敢起來，為建立一種新生活，一個新世界，而奮鬥。這個雜誌乃是後來幾次大運動底思想源泉，這些運動不久就震撼全中國，使幾百萬人從拜跪姿態站立起來了。新民族主義也是從此出發的，大戰以後各地被壓迫民衆底不安和騷動更加助長這個運動。

羣衆有了這種情緒，立即與日本帝國主義發生衝突，因為日本帝國主義利用大戰機會強迫中國接受了有名的二十一條要求而且佔領山東省。美國總統威爾遜好聽的諾言，允許各民族有自決權利，并能享受社會正義，遂給中國人一種希望，以為和會能夠滿足中國要求的。帝國主義馬販子在凡爾塞打破了這些幻想，於是青年人氣憤起來，反對北京親日政府底賣國。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學生舉行了廣大的示威。那些賣國總長底住宅被學生搗毀了。運動從北京普遍於全中國。全國運動中參加了新因素，即工廠工人也實行罷工以支持學生要求了。

工業發展造成了中國近代無產階級。一九一六年末，中國已有將近一百萬的產業工人，到一九二二年，這個數量增加了兩倍。二十萬華工被送到歐洲西戰線去，他們在那裏學會讀書，學會寫字，更重要的是與歐洲工人和歐洲較高的生活接觸。他們帶了新思想回國來，知道怎樣為較好的生活去鬥爭。他們看見了那些強大的民族糾纏於衝突裏面，回來後便決心要解放自己的民族。好多華工於山東問題爭鬧時，從歐洲趁船回來，路過日本埠頭拒絕登陸。當工人罷工擴大五四運動時候，這些回國華工已經被人視為『預告中國大潮之海燕

Harold B. Isaac 著
唐 威 譯

了。在新興的中國產業工人之中，這個新從戰地回來的華工隊伍形成了有階級覺悟的堅固的核心，幫助幼稚的幾乎剛出世的中國無產階級去担負重大的歷史使命。工業無產階級領導了幾千萬交通勞動者，苦力，傭員，工匠，學徒，而開始組織起來。與舊式獨家或合夥經營讓位於股份公司同時，過去的行會組織也解體了，分化為商會和工會。中國工人剛接觸機器，便投入政治鬥爭。一九一九年上海及其他城市的罷工迫得北京政府釋放示威的學生和罷免失民心的官吏。

五月四日運動漸漸漫於全國，引入於中國第二次革命。舊傳統堡壘崩潰之響聲震動了全國青年，使之覺醒。他們從城市和鄉村被吸引來，投入同一輩人底洪流，這一輩人是要操縱未來中國命運的，他們勇敢地打破權威枷鎖，大踏步前進推倒舊中國剩餘的牆垣。舊式的行動和思想方法之惰性仍舊存在，在未來的革命和調整中仍舊現出強大而可怕的形象，然而堡壘之門已經打破了。再不能堅守了。新青年眼睛離開了凡爾塞而轉向俄羅斯，那裏十月革命給了他們一個榜樣，一種靈感，比其現實有更多的威力。隨着十月革命來到中國的，還有歐洲社會思想底各種潮流；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馬克思主義。這些潮流在中國開闢了新的眼界，激起了一個真正的思想道德文學革命，很迅速地加深了政治改革和社會衝突之孔道。所有社會階級都加入政治鬥爭舞台。舊的政治團體獲得了新鮮的生命，新的政治團體也產生出來。

當一九一九年這些政治新潮開始泛濫時，主持一九一九年革命的國民黨是毫無力量的。其中右派分子，那些保守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成了軍閥底僚屬。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較急進的一派領袖孫文，則繼續進行他的軍事革命計劃，即利用較小的軍閥去反對較大的軍閥。他創立了一個政治哲學，概括於他的三民主義裏面，其中既不以簡單明瞭見長，也不以其體面而大膽處理中國革命社會問題是長。他的民族主義并未曾主張向帝國主義人實行鬥爭。當他做第一任共和國總統時，他對於列強態度是很懦弱的，即允許維持列強用武力從皇朝得來的特權和償付舊皇朝所欠的外債。（見 *Shun-chin Tai* 著的『廣州莫斯科協定對於孫文政治哲學的影響』，在『中國社會政治科學評論』雜誌，一九三四年四月至六月，第一一三頁。）大戰之後，孫文認為中國祇能寄託其希望於列強中間一種善意的合作。為此目的，他向各國政府提出一種天真的計劃，叫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為發展中國經濟資源而『誠意』合作。他確實有個幻想，以為外國強盜能夠絕食貪慾，而參加一種人人有利的『社會主義計劃』。他寫道：『我希望，這個計劃實行結果，現在的勢力範圍就可以消滅，國際商戰就可

以免除，互相毀滅的資本主義競爭就可以停止。最後勞資間的階級鬥爭也就可

以避免。』

孫文底民族主義也含有將被壓迫的中國轉變為壓迫國內少數民族國家的意義。他計劃如何『同化』滿蒙回藏諸族在漢族統治的一個大國裏面。民族自決，同反帝國主義鬥爭一樣，都是後來才入於他的思想裏面的。

他的民權主義主要是為了一種『訓政時期』而製定的，在此時期中有知的領袖將漸漸指導那些無知而貧困的羣衆去學會自治。這種民權主義，與人民直接奪取政治權利和自由之思想，是毫無共同點的。

他的民主主義代表了他的政治思想，關於中國經濟組織未來形式之活生生的問題，以及關於土地和農民之極重要的問題。他的『限制資本』和『平均地權』兩個公式經過了他自己和他的徒黨多次的修正和解釋。他希望經過『限制資本』（用甚麼方法去限制，他未曾明白說過）能使中國免於資本主義災害。『平均地權』則是一種計劃來調整農村不平等，但『須過去有財產的人不因此而受損失。』他的計劃是先同地主商定地價，以後地價增加之數都歸國家所有。國家有了購買力，就可以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造成較有利的條件。但他好久不敢太過公開傳播這個理論，爲了害怕得罪他的軍事盟友以及好多他自己的徒黨。他始終反對階級鬥爭思想，反對羣衆參加政治生活。他希望，他自己及其徒黨靠純粹軍事手段掌握政權之後，能够和平轉變中國社會，而不經過大的動亂。這就是他的無數次軍事同盟和軍事冒險之目的，這些事情每次都沒有好結果。

可是一九一九年以後新的政治傾向和羣衆運動之興起，給孫文底沒落的黨添加了力量；國民黨又活動起來。孫文開始向學生會議演說。當陳炯明允許他在廣州設立一個政府時候，他就與廣州和香港新成立的工會聯絡。

此時，無產階級政治團體也開始產生了。馬克思主義雜誌開始出現於大身開啓這個前途。一九一八年成立一九一九年形成的集團發展爲社會主義組織，由此再進一步就於一九二〇年成立中國共產黨了。黨底創立者都是五四運動底領導人物，其中主要是陳獨秀，那時在北京大學當教授。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開第一次全國大會時，代表成分是很複雜的。無產階級出身的，很少。多數是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爲新學醒所激發的。他們未曾經過訓練，未曾經過考驗，就合成一個團體；事變發展不久就使這團體分化了。比其中大多數人所期待的更早些，階級鬥爭以其強烈的日光照射了每一個人，如此強烈，使他們

向四面八方分散了。不少的人，爲了感情，或爲了無政府主義傾向，很快就退出而走入資產階級營壘去。*有些人則消極而退出政治舞台。其他的人如李大鈞則註定於後來門爭中犧牲生命。其餘的領袖中，如陳獨秀、毛澤東、張國燾一流人，則其命運交織於後來的中國歷史中，此歷史是從一九二一年這個夏天他們效力於共產主義事業時候開始的。中國共產黨是在俄國十月餘熱之中產生的，在此次會議上提出了爲中國工人階級製造組織武器之任務。這個工作已經開始於北京郊外的長辛店了，那裏鐵路工人已經成立了一個工會，共產主義傾向的大學生也已開辦幾個夜校了。一個『勞動組合書記部』設立於上海。進行是很遲緩的，開始是沒有甚麼成績的，問題是廣泛而困難的。因爲歷史把成人負的任務加於尚在孩童狀態的階級身上。

共產黨面臨的第一個問題，乃是牠以無產階級黨資格，對於資產階級國民黨，應有甚麼關係的問題。共產黨參加國民運動的形式和方法，對於未來事變全過程有決定的意義。這種參加是出於國民革命運動之無可否認的進步性。我們已經說過，列齊會於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席上指出：在帝國主義時代，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是可以同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相合流的。與國民運動相合作，是可以的，必需的，但有一個極重要的保留條件，即無產階級組織，『即使尚在其胚胎狀態』，也必需保持獨立。

一九二二年，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討論共產黨和國民黨同盟計劃。當共產主義青年國際一個代表，俄國人達林，將這個計劃向孫文提出時，孫文拒絕了。他告訴達林道，他可以容許共產黨黨員加入國民黨，但不贊成兩黨同盟。不久之後，馬林在杭州西湖參加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會議，提議共產黨黨員加入國民黨，利用國民黨廣大的寬鬆的組織機構來發展自己的宣傳并接近羣衆。馬林是共產國際派來中國的第一個代表，他已經在南方與孫文接觸過。

馬林底提議根據下面三個理由。第一，馬林是根據他自己在爪哇工作的經驗。戰前，爪哇社會民主黨左派加入了 *Socialist Tatan*，這是一種混合經濟社會宗教的運動，爲了反對歐洲殖民者對於爪哇人的剝削。其中左派會接受『印度社會民主聯盟』之援助，這聯盟就是馬林幫助組織的。牠在 *Socialist Tatan* 內部開始發展工會組織思想，大戰幾年中左傾運動之增長是出於牠的功績。第二，馬林是根據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戰略和策略的結論，他認爲這些結論特別適用，因爲——這是他根據的第三個理由——國民黨和南方日益增長的工人運動之間早已有了關係，那裏，在孫文影響底下，工會已經參加國民運動了，而且找到了最豐饒的地盤來發展共產主義活動。*

據馬林說，中國共產黨中央大多數贊成他這些見解。反對他的提議的人，不過懷疑國民黨沒有大的政治力量，懷疑國民黨能發展爲一種羣衆運動。馬林把陳獨秀列入於贊成他的提議的人中。但陳獨秀自己關於一九二二年的杭州會議則有不同的說法。他說，中國共產黨全體中央委員都反對馬林底見解。陳獨秀把這反對說成含有根本的政治性質，認爲反對的人都相信加入國民黨『將混亂了階級組織，將拘束了我們的獨立政策。』（見陳獨秀『告全體同志書』，上海，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但我們沒有證據可以證明那幾年間中國共產黨領袖曾反對與資產階級合作。反之，這種合作思想完全支配了他們。陳獨秀在一九二二年寫道：『與革命的資產階級合作乃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必須經過的道路。』（見『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對加入國民黨的，無論是全體領袖或幾個領袖，似乎更多根據國民黨業已死亡爲理由。據馬林說，杭州會議中反對加入國民黨最有力的張國燾，就是表示這的意見。但最後，馬林底提議通過了，雖然人們還在懷疑國民黨領袖是否歡迎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

*中國共產黨創立人中有戴季陶，他幾個月後受了孫文嚴厲的斥責就離開共產黨了，後來成爲國民黨內主要的資產階級思想家。其他早期離開共產黨的人中，有陳公博、周佛海、邵力子，這些人後來都是國民黨政權下的人。（原註）

**這是一九二五年間著者在荷蘭德丹訪問馬林時，親自聽馬林說的。

（原註）

***據陳獨秀說，馬林最後拿出共產國際紀律來，這提議才被通過了的。但馬林否認這話。他說中國共產黨中央儘有可能向共產國際較高機關去控他，但並沒有人上控。他又說：『此外，共產國際并未給我特別的訓令，我手裏也沒有任何文件。』共產國際未公布的和不讓人看的文件中無疑可以解答這個問題。據共產國際遠東局的米夫說，第一個正式訓令，關於『調整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活動』的，包含在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底一個特別通告之中。此時共產黨黨員已經加入國民黨了，雖然正式的決議通過於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大會上。（見米夫著的『英勇的中國』一九三七年紐約出版，第二一二—二二頁。）